

千家駒
經濟論文選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千家驹经济论文选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7年·北京

千家驹经济论文选

* *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210千字 $8\frac{5}{8}$ 印张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 * *
ISBN7-80035-012-6/F·3

书号: 4445·003 定价: 2.30元
2.10

自序

我是研究经济的，但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没有写过一篇经济文章。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文革”时期，我的所有著作均被视为“毒草”，我也被打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五七干校去改造。我气愤之余，遂把我所有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付之一炬，把我写的书全部以低廉的代价卖给收购废品的，并发誓以后永远不再“放毒”了！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在1962年我国由于天灾人祸而陷于经济大困难的时期，我曾联合五位经济学者（陈翰笙、彭迪先、关梦觉、沈志远、吴半农）在全国政协三次大会上做了一个发言，提出了三条建议：（一）“粮食过关”应该是指全国范围而说的，不是要求每一公社每一生产队都要粮食自给，如果要求每一公社每一生产队都要粮食自给，就会把经济作物挤掉了。（二）我们反对当时提出的工业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口号，认为如果这样，上海、天津、青岛等许多轻工业基地的工业原料哪里来呢！（三）我们主张开放农村集市贸易以活跃市场。这个发言是我起草的，而按姓氏笔划我又排在第一名，同时在大会上也是我代表他们五位上台去讲的。殊不料这样一个仅仅是经济学ABC的合理化建议，在当时‘左’倾错误思想下竟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全国政协的下次大会上，有一位民主党派领导同志说，上次政协大会上有个别民主党派成员假借政协庄严的讲坛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要“挖社会主义经济的墙脚”云云。他虽未点我的名，但谁都知道这是针对我而说的。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写经济文章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对过去在经济工作中指

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我们不仅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对所谓“三面红旗”重新作了评价。80年代以后，政治空气也比较宽松了。我在1980年的人民日报上接连发表了两篇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香港某报记者竟发了一个专电：

“久矣乎不见千家驹发表文章了，最近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都是谈教育而不是谈他的本行经济的。”因此有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已经改行了呢？我说，我没有改行，只不过在我国，经济问题是很敏感的禁区。朋友们说，三中全会以后形势大不相同了，并且中央一再声明实行“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戴帽子），你还是可以搞经济呵！于是民盟同志安排我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做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我讲了一些老实话，很受同志们的欢迎。从此以后，各地的学术团体、大专院校、政协、民主党派纷纷约我去做学术报告。在这六七年内，我先后去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做了不下100次的学术报告，听众多的达五六千人，少则数百人。又写了几篇经济方面的论文，还出版了关于历史货币的专著，这就是我重理旧业的经过。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要出版我的经济问题论文集，我把最近六七年发表的文章，系统地整理一下，计可分为六类：

（一）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专著，如《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现代化运动》、《论英国的产业革命与鸦片战争》、《旧中国的公债发行及其影响》等等，其中有的是当前大家所关心的现实经济问题，有的则属于经济史的范畴。

（二）是我在专门学会上的学术报告或发言。我是中国钱币学会的副理事长，中国财政学会和中国金融学会的顾问。各学会开年会或学术讨论会时，一般我要准备论文，有时还要做总结发言。这里共选登了五篇，三篇是我在中国财政学会上的发言，一篇是我在中国金融学会上的书面发言，还有一篇是我在中国钱币学会上的总结发言。

(三)是我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发言。我是全国政协常委，自政协恢复大会发言以后，在1984年、1985年、1986年、1987年我都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其中有论及经济问题的，也有论及教育问题的。

(四)是我出席国际性经济会议的发言或应国外经济团体之约而写的论文。这里也选了比较重要的三篇，其中一篇是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成立30周年而作的，发表在日本报刊上。另两篇，一篇是我在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一篇是1986年9月在日本召开的展望21世纪前景的中日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

(五)是关于经济特区的，也选了三篇。我是深圳特区经济学会的名誉会长，每年我都要去特区几次。这里也选了三篇，一篇是谈关于我国经济特区的几个理论性问题。一篇是我1986年12月在“深圳特区经济发展新阶段研讨会”上的发言。一篇是我1983年在深圳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六)是我在各地所做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选了1981年、1982年、1983年、1984年的各一篇。1985年我也做了报告，因所谈的与我在美国《知识分子》发表的论文基本相同所以略去。1986年我在政协大会上作了发言，对经济形势有所评述，所以也不重复了。

以上共计六类，计23篇约21万字。这些文章均散见于各报章杂志，读者难以窥见全豹，现在汇为一编，其中虽不免有重复之处，但这也足以证明我的观点是始终一贯的。此外，近几年来，我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将由另一出版社汇集出版，本书概不列入。

我国的经济正处在体制改革的十字路口，处在新旧交替的时期。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我们充满信心。但这条道路也是曲折而不平坦的，“左”的阻力还是

很大，何况世界上没有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但只要我们勇于探索，面对现实，不搞浮夸的一套，而是实事求是地尊重专家，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而不是按主观意志办事，我们是一定会成功的。经济科学的规律和自然科学的规律一样，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来为人类社会服务，但是我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斯大林）那种认为人的主观意志可以改变客观规律，或者政治权威者的一两句话就可以创造客观规律的想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其结果只能是在客观规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建国30多年来我们这方面的教训真是太多了！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容不得半点浮夸和虚伪。一定要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深入改革，否则就建不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实事求是贯彻改革开放的条件，没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也就谈不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本书所选的虽仅是我六七年来所写的一部分经济文章，但多少可以代表我个人的经济思想和我对建国后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所走过曲折道路的经验总结，假如对读者能有些微的贡献，那就是我意外的收获了！

1987年2月10日 北京

目 录

自 序.....	(I)
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运动.....	(1)
论英国的，业革命与鸦片战争.....	(29)
论旧中国的公债发行及其经济影响.....	(44)
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要反对两种偏向.....	(75)
关于消灭我国的财政赤字问题.....	(83)
必须逐步解决财政补贴问题.....	(96)
财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	(101)
关于改革我国的金融体制问题.....	(112)
开拓一条研究中国钱币的新路.....	(116)
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发言(1984年5月).....	(123)
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发言(1985年4月1日).....	(132)
谈物价、特区和义务教育问题(1986年4月11日).....	(137)
抓精神文明，促经济建设(1987年4月8日).....	(145)
中国的对外开放与中日经济合作.....	(155)
在中日民间人士会议上的发言.....	(161)
以长期的战略眼光加强中日经济合作.....	(168)
在深圳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3年9月23日).....	(172)
关于经济特区的几个理论问题.....	(178)
深圳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189)
关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调整问题.....	(194)
谈当前的经济问题.....	(215)

学习赵紫阳总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的体会.....(227)

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问题.....(256)

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 现代化运动

今年四月间我访美时，在纽约承李又宁教授赠我一本《知识份子》（1985年1月冬季号），拜读之后，认为这确是一本质量相当高的综合性刊物。例如这一期的“访问鲍大可”、“南北经济对抗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中国应该怎样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等文章，都是很有见地，堪称是高水准的论著。我经常觉得：海外学者对新中国的一些观察、批评与判断，有时比国内的某些论著还要客观、深刻，甚至正确。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框框，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可以畅所欲言而无所顾虑。其次，他们有比较鉴别，不若我们自己那样“坐井观天”。正如中国古语所说：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远处事物的整个形象才能看得更清楚。有了比较，才能辨别先进与落后，是与非，优与劣。站得太近，或者身在里面，反有“一叶障目”，“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见泰山”之讥！所以我最爱读海外学者对中国的评论，这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思。

不过，另一方面，海外学者（包括美籍华人，华裔学者或外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即所谓“中国通”）究竟身在海外，远隔万里，有的由于对问题的具体情况不够了解，或者对问题的历史背景不够清楚，个别的还由于偏见太深，他们的某些看法，就难

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他们的结论，时而不免流于悲观，时而又不能流于乐观，恰如其分的不是没有，究属较少。以上是题外的话，下面讲到正文。

今年我去美国访问时，本来准备一点关于中国经济的材料，想向海外华侨学者同行请教，奈以时间过于匆促，始终没有机会深谈。仅在几个大学召开的座谈会上，与美籍教授、华裔学者泛泛讨论一下。我的初步印象是：他们中绝大多数对于中国大陆所采取的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经济政策表示欣赏，但信心不足。他们顾虑的是：中国的政策会不会变？中国会不会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们也相信，在邓小平政权之下，中国政策是不会变的，但邓毕竟是80多岁的高龄了。其次，他们多数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让步，或者是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但这种转化能行得通吗？有的还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了。个别朋友甚至提出：中国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还不够，必需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才能使中国现代化。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要实行市场经济，不仅要有商品的自由市场，还要有资本与劳动力的自由市场。他们说：商品、资本、劳力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的，仅有商品的自由市场还不够，还要使资本与劳动也能自由流动，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能的。的确，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概念来解释中国的体制改革有时是十分费解的。对于这一类问题，我在座谈会上因时间关系，也没有深入的探讨。

关于中国的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我对他们说，中国的政策决不会变，也不可能变，这不决定于邓小平个人，因为这个政策是深得人心，为中国人民所拥护的。它也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至于中国会不会再来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这绝对不可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的创痛太深了。“文化大革命”一无是处，如果说它也有一点点积极作用的话，那就

是它反面教育的作用，即它教育了中国人民，看清了“文化大革命”荒唐而又丑恶的实质，那样的蠢事在中国绝不能再演了。

“物极必反”，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规律。只有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创巨痛，才能彻底反省“文革”以前所执行的极左路线，否定“三面红旗”，否定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并为绝大多数仅仅因为说了真话、老实话而被划成右派的人平了反。不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恐怕到今天也不敢否定“伟大领袖”所制定的“三面红旗”，也不会产生今天的路线。“文化大革命”是愚昧与无知的产物，这只能产生在“神权”时代。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搞了“个人迷信”的造神运动，把毛泽东吹捧成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绝对正确、绝对英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神”，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绝对没有错的。所以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敢于提出反对甚至怀疑的意见。这种“造神”运动，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这近于神权时代的迷信。迷信是不讲理智的。欧洲的中世纪何尝不如此，西方只有经过十七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才逐渐脱离教会的统治。中国没有经过新启蒙运动，没有经过“文艺复兴时代”，（五四运动有类于此，但五四运动并未完成它的使命）愚昧与无知一直统治着中国。中国有二三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帝皇将相，都是利用“神权”来统治老百姓的。不管更换了什么朝代，贴了什么新的商标，中国社会的底子并没有改变。1919年的五四运动，我国少数有识之士（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先进人物）提倡“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这确是治中国愚昧与落后的对症良药。但是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尚未完成，即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五四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生存的矛盾超越一切。“德先生”与“赛先生”不能不退居一旁，让位于抗日救亡运动，因为中国如果亡了国，还谈得到什么“民主”与“科学”呢！于是有1937年—1945年的8年抗日战

争，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就这样中途夭折了。接着又是1946年—1948年的3年国共之战，终于1949年中国共产党统治了中国。本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德先生”与“赛先生”仍然为我国所必需，无奈中国领导人在“左”倾路线统治之下，竟把“德先生”与“赛先生”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加以反对、批判。（这是指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象“知识愈多愈反动”、“知识愈多愈愚蠢”等口号，不是反对科学是什么呢！）象“文化大革命”这样大革文化之命的蠢事，在西方国家是不可能想象的，但在一个文盲、半文盲占人口1/3以上（指12岁以上人口），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中国，却是不难理解的了。

最近（6月6日）赵紫阳总理在伦敦答复记者问中国会不会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时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是一场灾难和浩劫，中国人民受到了很大的创伤，正是由于如此，就难以设想会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场严重的灾难，今天世界上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积极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这两者的道理是一致的。”（1985年6月6日人民日报。）赵总理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既不可能重演，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不会改变。但是海外的有些朋友把中国的新政策视为中国经济走向资本主义或者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却是一种误解。其所以有这种误解，是因为他们心目中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的经济（包括东欧国家），舍此以外没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应作教条主义的理解。马克思生在一百多年以前，那时候还只有蒸气机，连电灯也未发明，更不要说电子计算机了。近一百年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是马克思生前所不能预见的。马克思只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只是提出了这种理想，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至于社会主义究竟

是什么具体模式，并没有提出什么蓝图来，因为他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1917年十月革命后，地球上才出现了苏俄（还不是“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革命胜利后，在经济建设上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苏俄的模式是在它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的。例如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以及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这都与当时苏俄的国际环境与国内条件分不开的。即使是成功的经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不一定非照样画瓢不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帝国主义对华进行封锁，同时世界上也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取法。（东欧国家也是苏联模式，只有南斯拉夫例外，但南斯拉夫被斯大林视为“异端”，是“修正主义”。）所以毛泽东提出“一边倒”，“以俄为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上，中国还是采取自己的一套，向资本家付定息，用赎买政策，没有仿效苏联无条件没收的办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在苏联援助下搞了156项工矿企业，奠定了中国基本工业的基础，这是应该肯定的成绩。但不幸由于三大改造（即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提前完成，胜利冲昏了某些领导人的头脑，先来个“大跃进”、“大炼钢铁”，再来个“人民公社”运动，不顾主、客观条件，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提出了所谓“穷过渡”、“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等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从此，好大喜功，浮夸图虚名而不求实惠的“左”的思潮占了上风。再加上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把知识份子的嘴都贴上了封条。把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叫做“促进派”，把说真话、老实话的叫作“促退派”，说“我们要做‘促进派’不要做‘促退派’”。大家知道：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并不是因为他们说错了话而是因为他们说了真话而被打成“右派”的。连彭德怀这样一个为共产党打江山，建下了不世功勋的元帅，国防部长，也仅仅因为他说了几句真话，

而被打入阴山背后，别人还有谁敢说真话呢？！由于“大跃进”而造成的三年大灾荒，饿死的人数以七八位数字计，连刘少奇也不得不承认：“三年困难，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于是才有1962年的国民经济大调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才使1965年、1966年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当国民经济刚刚恢复了一点，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浩劫，使中国人民重新坠入苦难的深渊。终算天有眼，“四人帮”被打倒了。然而“四人帮”打倒的初期，“凡是派”还当权，于是又来了一个“洋跃进”，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纯属主观主义的“十年规划纲要”，继续搞“左”的浮夸的那一套，结果使我国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直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务实派掌了权，才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拨乱反正，彻底清算过去那一套“左”倾错误从农村开始进行改革，在短短的四五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在中国农村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农民面貌改观，衣食丰足（还有少数地区温饱问题，尚有待解决），这是中外人士有目共睹的。但是工矿企业经济效益依然不高。所谓经济效益乃指“投入与产出”而言，投入少而产出多表明经济效益高，反之则低。为什么经济效益始终不高呢？这是因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障碍还没有根本消除。计划经济、劳动、物价、工资体制等等方面基本上还是苏联50年代的模式。（苏联60年代与70年代在经济体制上也进行过两次较大的改革。但由于中苏邦交60年代起开始恶化，我们把苏联那一套统统视为“修正主义”的，不但不向它学习，连研究也不研究了。）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苏联50年代模式僵化并进而发展之！“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

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以上引文见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面简称“决定”。）特别是价格体制不合理，把“稳定物价”理解为“冻结物价”，形成了价格的20年一贯制，30年一贯制。价格与价值相背离，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与生产成本完全脱节，也不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在劳动工资体制上，大家吃“大锅饭”，捧“铁饭碗”。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赚钱亏本一个样，赚钱是国家的，亏本也是国家的。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安排，统一分配，企业无权雇用职工，亦无权解雇职工……，凡此种种，有的是苏联已经改了的，而我们坚持不变，有的是苏联反面的经验，我们照抄不误，并从而发展之。30多年来，我们一贯追求的是“高速度，低效益，图虚名而不求实惠”的一条经济路线。这种体制，如不进行根本改革，不但经济效益提不高，实现四个现代化也将变成一句空话。

我们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35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探索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可以概括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两句话。这既谈不到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让步，更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走向资本主义化。邓小平说得对：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又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怎样发展生产力，怎样改善人民生活，这个问题就摆在我们的前面。”

一些外国朋友认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在中国国内，也有些“左”的思想流毒尚未肃清的人，认为“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就是“社会主义”，“一大二公”就是“社会主义”，“艰苦朴素”就是“社

会主义”。

1984年10月20日公布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正如赵紫阳总理所说，它“标志着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文件肃清了我们过去许多糊涂观念。

例如“决定”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能把贫穷当成社会主义。”这就批判了过去那种认为“富则修”、“穷过渡”、“愈穷愈光荣”的错误思想。

又如“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商品生产不等于发展资本主义。它说：“由于长期以来，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形成了若干不适合实际情况的固定观念，特别是由于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把搞活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活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又如社会主义经济也要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这在“决定”中正式明确了。过去一提到“竞争”就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弱肉强食”，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决定”中说：“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竞争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其实，只要有商品生产就必然有竞争。”“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弱肉强食不同，它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计划的法令的管理下……让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优胜劣汰。”中国过去由于没有竞争，由